



一流大学研究文库
WCU SERIES

世界一流大学

面向全球共同利益 服务本土社会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and
Seeking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s

吴燕 王琪 刘念才 主编
陈珏蓓 江雨澄 田琳 翻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总 序

世界一流大学是高等教育的旗帜,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出台了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和举措。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施“211 工程”“985 工程”等重点建设计划,2017 年正式实施“双一流”建设计划。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标志着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紧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把握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脉搏,立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际需求,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方面的全球第一本中文、英文著作;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等形式先后给政府部门提供了三十余份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咨询报告,其中若干份报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和肯定;以个别咨询和参加座谈等方式为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的相关领导提供了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咨询建议。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制并于 2003 年开始发布的世界首个多指标全球性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作为全球性大学排名的中国标准,引领了全球性大学排名的发展方向,影响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生态。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 2005 年发起并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之后隔年举办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七届,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交流平台。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 2007 年开始组编“一流大学研究文库”,至今已经出版著作三十余部,品牌效应开始显现。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流大学研究文库”将坚持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特色与国际经验相结合、定量研究与经典案例相结合,

持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为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和建设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流大学研究文库”期待与国内外世界一流大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和实践专家携手合作,主要选题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年度报告)、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与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与创新以及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经典译著。

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任

刘念才

2019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导言 世界一流大学：面向全球共同利益、服务本土社会	...1
---------------------------	------

上篇 全球视野与理论视角

第一章 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合作与国家竞争	...11
第二章 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差异化：建立与完善 高等教育系统的必要性	...49
第三章 “后真相”世界中的世界一流大学	...62
第四章 大学排名与战略规划：高校区域贡献的差异	...79
第五章 创建一所全新大学的艺术之谈：经验的启示	...91
第六章 世界一流大学：“共益”视角下的双重身份	...103
第七章 美国世界一流大学在贡献全球共同利益中的作用	...127

下篇 国家政策与区域性反馈

第八章 追求卓越研究生教育与科研并服务区域发展	...149
第九章 世界一流大学对开放型社会的贡献：中国高校 肩负的使命	...172

第十章 世界一流大学与全球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在 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中的作用	...195
第十一章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利弊与风险分析	...210
第十二章 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寻求国际竞争力、 地方和国家之间的平衡	...220
附录 本书作者简介	...234

导言

世界一流大学：面向全球共同利益、 服务本土社会

吴 燕 王 琪 刘念才

世界一流大学，常常与研究型大学或旗舰大学交替使用，通常被视为一个学术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致力于在一系列学科领域中创造和传播知识；在各层面实施精英教育；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需要；并为全球和国家公共利益作出贡献（Altbach, 2009; Liu, 2009; van der Wende, 2009）。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被全球各种利益相关者纳入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政策议程。世界一流大学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大学排名的繁荣，这样一种“世界一流”运动得以强化和显现（Salmi, 2009; Hazelkorn, 2011）。

在此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于 2005 年发起了两年一度的“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会议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校管理者、政府官员、著名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共同讨论与世界一流大学有关的议题。这些具有时效性的主题包括：从全球、国家和院校的层面讨论发展学术卓越的战略和挑战，世界一流大学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如何平衡并整合一流大学的知名度与绩效等。

第七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于 2017 年 11 月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世界一流大学：面向全球共同利益 服务本土社会”（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and Seeking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s）。本书汇集了此次会议的优秀论文，就世界一流大学如何为全球共同利益作出贡献以及平衡其在全球、国家和地方中的作用提供了前沿的信息

和见解。

一、世界一流大学和全球共同利益：会议背景

会议主题的选择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报告中的主张，即在全球化以及个人、社会、国家和市场深受其影响的时代，我们需要把教育理解为一种“全球共益物品”(a global common good)。

1. 将高等教育重新定位为一种全球共益物品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是公益物品(public goods)这一观点已是广泛共识。通常，高等教育被视为承担着传播知识并为所有人带来社会公共利益(public good)的作用与角色。然而，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格局正在模糊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简单二分原则。“公共”的含义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增加，越来越高的削减公共资金的呼声，利益相关者的多样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参与以及新兴的全球治理形式(UNESCO, 2015; Marginson, 2018)。此外，高等教育不断国际化，全球范围内大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日益加强。当前，国际化发展削弱了国家的概念，从而形成了公益物品的概念。但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公益物品这一概念已经难以适用于高等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提出“全球共同利益”(global common good)的概念，将其作为“公共利益”的“建设性替代”，并建议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益物品(global common goods)。这种全球共同利益的概念在定义教育性质时采取参与性进程，并强调教育作为一种共同的社会行动、社会责任和对集体的承诺，应该具有集体性和包容性，这一概念还重视“背景、世界观和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同时尊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同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例如技术转型和就业模式转变、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以及社会文化转型等。

本书中的第一、六、七、九和十章对高等教育，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有关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和分析。

2. 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全球共益物品服务

在当前全球高等教育转型的背景下，大学面临着风险，其公民角色和社会责

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挑战。研究人员担忧高等教育正在成为一个“与客户和利益相关者”的市场。世界一流大学也不例外。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学术卓越的追求已在全球范围展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积极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提升其全球声誉和知名度。然而，有人认为，这场世界一流大学运动引发了一些问题。一些顶尖大学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断寻找额外的资金（由于近年来公共资金严重减少），受到排名活动过多（第四章）的困扰，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象牙塔综合征”（第三章）。大学对卓越和国际地位的争夺使得已有的等级制度增强，因而受到批评（Rhoads, Li & Ilano, 2014）。此外，人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降低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作用和对当地社区的贡献，从而脱离了更广泛的高校环境，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受到质疑（第二、三章）。

尽管如此，人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即“开放的全球空间”（第一章），它作为一种全球共益物品服务于社会。这些大学汇聚人才，拥有充裕资源，并有着良好的治理模式，因此人们相信这些一流大学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造福全世界，发展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研究，为当地社会和全球的迫切需要而服务（第五章）。

3. 探寻学术卓越的可持续生态系统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与其所在高等教育系统不断脱离的问题，最近的文献越来越强调发展具有差异化的世界一流大学体系的重要性。这一点在本书中有所体现。高等教育扩张涉及所有高校的所有任务——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但重点不同。国家和高等教育系统监督机构需要仔细评估其需求、资源和长期利益，并根据其国家和院校模式制定相应战略。

阿特巴赫和萨尔米（Altbach & Salmi, 2011）也提醒我们，教育改革和变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对世界一流大学运作的全面分析需要考虑院校发展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包括宏观环境的要素、国家层面的领导、治理和监管框架、质量保证框架、财政资源、激励措施、信息获取、位置以及数字电信基础设施等问题。由于每个国家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不同，其中一些因素可能是绝对必要条件，而其他因素并非完全不可或缺。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相当重要（同上）。国家和监督其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需要仔细评估其需求、资源和长期利益，并根据国家和高校的模式制定战略。追求学术卓越没有通用的模型或配方（Salmi, 2009）。

二、本书各章节内容提要

为了反映上述观点，本书旨在从比较的视角对以下主题进行讨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终目标、使命和作用；发展其确定、规范、衡量和资助教育全球共益物品的机制；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在发展全球共益物品、平衡国家贡献与地方参与之间角色的战略与方法，以期实现全球可持续性。本书由上下两篇组成：“全球视野与理论视角”“国家与区域性反馈”。

1. 全球视野与理论视角

上篇从“全球视野与理论视角”探讨和定义了全球共同利益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这部分还讨论了面对世界各地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的转型，高等教育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讨论了大学如何为全球共同利益服务并作出贡献。

马金森(第一章)首先讨论了世界一流大学对全球共同利益的实际和潜在贡献。他回顾了公益物品和共益物品的定义，并认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密集型大学有关的最重要的全球共益物品是研究、交流和人员流动。通过分析和绘制过去二十年科研产出和世界研究系统的合作模式，马金森强调：世界一流大学日益整合为一个单一的集体网络整体，并通过合作研究以正和(positive sum)的形式运作，尽管很多严重的问题(例如人才流失、英语和非英语语言使用的不平等问题等)尚未得到充分解决。这种新兴的全球科学体系超越了国家民族的概念，正在形成一个全球化却又多样化的社会。然而，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加强与当地的联系和贡献，以及怎样推进全球共同议程。

阿特巴赫(第二章)着眼于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探讨。全球高等教育系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确实，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一小部分，占据了最大的研究产出份额，是最国际化的院校，同时也培养了人才，但它们往往忽略了它们存在于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对其他学术机构负有特殊责任。阿特巴赫提醒我们，教育改革和变革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对世界一流大学运作的完整分析需要结合高校发展的生态系统来考虑。

德马瑞特和萨尔米(第三章)探讨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为后真相(post-truth)世界中的全球共同利益作贡献。他们认为，这些领先

的大学应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包括:包容性与多样性,培养有道德的专业人才和忠诚的公民,开展相关研究,改善沟通渠道,与社会和世界接触以及对环境问题的责任等。德马瑞特和萨尔米赞同马金森的观点,他们强调这类大学通过合作来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并重申了“上海原则”(Shanghai Principles),即“包容性、道德性、客观性、相关性和全球合作”。

从大学战略规划来看大学的第三使命(社会服务),李、万斯和斯坦塞克(第四章)考察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70多所大学的文件,调查并比较了进入排名和未进入排名高校之间的战略。他们的发现表明,在进入排名和未进入排名的大学之间存在模式上的差异——进入排名的大学将其战略规划置于更加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而未进入排名的大学则更加注重本地化。作者建议,第三使命的活动应超越市场,在评估和衡量大学绩效和质量时不应被排除在外。

建立学术卓越的重要策略之一是从无到有建立一所大学(Salmi,2009)。萨尔米(第五章)基于他们最新的有关新型研究型大学项目,采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了全球八所大学发展的特点、机遇与挑战。除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共同特征(即人才汇聚、资源充裕和良好治理)之外,其他普遍特征还包括强有力的领导、国际伙伴关系、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以及当地和国家之间均衡的作用。萨尔米重申了生态系统对于实现学术卓越的重要性。

田琳(第六章)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四类官方文件(校长信息、使命宣言、愿景陈述和战略计划)进行了话语分析,调查世界一流大学在服务全球共同利益中的作用。该章首先回顾了高等教育中从公共利益到共同利益的概念转变。其调查结果揭示了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共同利益方面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这些领先大学作为全球共益物品,强调全球发展和全球社区福祉;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全球性科学研究合作、强调人类发展、发展全球互联互通和福祉,为全球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2. 国家政策与区域性反馈

下篇“国家政策与区域性反馈”反映了政策趋势和国家区域背景的变化,提供了深入的案例分析,并探讨了国家和地区政府与高等教育院校在平衡其各自在全球参与和本地贡献中的角色与作用。

沙克尔和普莱特(第七章)聚焦美国的高等教育问题,回顾了美国的顶尖大学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发挥公民作用,并认为其对全球共同利益的承诺与“世界一

流”这一概念相互交织，且顶尖大学需要维护对公众的承诺。虽然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增加了不确定性，但作者认为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教师群体是有效履行公共承诺并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关键力量。

卡拉姆等人(第八章)聚焦美国得克萨斯州，分析该州在发展竞争力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虽然得克萨斯州研究型大学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该州的大学很少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资助这些学校的联邦资金也相当稀少。得克萨斯州应该在研究竞争力方面争取更多的公共投资，从而使该州能够提高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的质量，同时满足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范德文德(第九章)、白杰瑞和谢爱磊(第十章)的两章揭示了中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日益增长的全球性作用，特别是相对于西方而言。范德文德将文章置于全球当前政治环境的背景下(即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加剧以及中国的崛起)，讨论了对世界一流大学和欧洲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白杰瑞和谢爱磊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和联系。这两章有一些共同的观点：目前关于大学改革的论述已转向“共同利益”的概念，中国应与世界其他大学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这些对于解决全球问题和应对全球挑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高等教育最近的发展，既可以看作是一个政策重心强烈聚焦于西方(扩大和多样化)的追随者，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对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产生影响的领导者，而且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有更重要的影响。这就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延续性的问题，并要求了解全球化中东西方的异同。白杰瑞和谢爱磊还指出，中国和美国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增长以及院校中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和公平性问题。

黄福涛(第十一章)描述了高校校长们对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其公益物品的看法。校长们对国际化利益和风险的看法表明，不同类型的高校(即国立、地方和私立大学)之间存在差异。然而，为了提高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受到高度重视，并在学术发展上给予了优先地位，这已经是一个普遍共识。国际化被视为公益物品，旨在提高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国际意识，在研究和知识创造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这与西方同行的“创收”观点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发展学术卓越，启动国家重点建设计划是世界各国政府经常采用的战略之一。尽管取得了积极成果，但这种做法常常受到质疑或挑战，因为它在政府

责任和高校自治之间,以及全球竞争力和地方承诺的目标和重点之间进行权衡。佛洛曼与理修金(第十二章)通过密切关注俄罗斯及其国家卓越计划“5-100计划”(Project 5-100)来回应这些问题。他们认为,高校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展全球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同时,这些获得资助的高校也对地方和国家的需求做出了更多回应,形成了一种“多元化大学”模式(a multiversity model)。作者认为,这种多元大学模式确保了大学相对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并提供了很好的本地支持,从而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学术卓越发展的生态系统。

本书不仅呈现了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关议题的讨论,也是我们之前六届会议及论文集的续集,这六本书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特征·评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创新·改革》《世界一流大学:国家战略与大学实践》《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从声誉到绩效: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ALTBACH PG. Peripheries and centers;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009, 10:15-27.
- [2] HAZELKORN E. 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attle for World-Class Excellence[M]. London: Palgrave, 2011.
- [3] LIU NC. Building up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 comparison[R]. Presentation at 2008-2009,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2009.
- [4] SALMI J. 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M].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9.
- [5] MARGINSON S. Public/private in higher education; a synthesi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8; 43(2): 322-337.
- [6] RHOADS RA, LI S, ILANO L. The global quest to build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oward a social justice agenda[J].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2014 (168): 27-39.
- [7] UNESCO.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R/OL]. Paris: UNESCO, 2015; [2017-01-28].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5/232555e.pdf>.
- [8] VAN DER WENDE M C. European Responses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Occasional Paper Series[J]. Berkeley; 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9; No.7.

—— 世界一流大学：面向全球共同利益 服务本土社会 ——



上 篇
全球视野与理论视角

第一章

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合作与国家竞争

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

一、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到来,高等教育与科学的规模、范围和贡献都发生了变化。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美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参与型高等教育,该体系拥有更多、更大规模和不断发展的院校,以及分散(虽不均衡)的科研能力。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创造了一系列广泛的个人和集体物品^①并与全球其他国家广泛联系,这一体系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扩展。美国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与科学发展影响深远,被视为成功模板,甚至在诸如语言的使用和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形式等方面具有一定“霸权”——但并非完全是决定性影响。标准化全球模板与本土体系和机构结合了起来。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的逻辑更像是开放式的协作网络(Castells, 2000),而非垂直的指挥系统,也非市场份额封闭的寡头垄断,或技术优势的军备竞赛(尽管时不时地,高等教育和科学以不稳定的方式附加到这些类别的国家或商业项目中)。

这种协作的全球网络不断受到跨境科研交流和人员流动的影响,这是基于科研的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全球共益产品。主要体现在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科学国家和研究密集型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 universities),这些发展不

① 本文以绝对方式而非相对方式定义“世界一流大学”(例如,排在前 100 名或前 500 名的大学)。例如,基于比较前 500 名的定义掩盖了机构绝对水平的提高,以及固定数量或科学产出质量水平的机构数量的增长。根据 Clarivate Analytics 或 Scopus 的测量,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简单绝对指标是过去四年发表的论文超过 1 000 篇。根据 Clarivate 数据,在莱顿大学的排名中,根据 2012—2015 年的产出,截至 2015 年底,有 903 所这样的大学。

仅通过知识流动的典型网络得以推动,而且通过全球经济能力的扩散得以发展。

1. 参与

从1995年到2015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研究所衡量了世界高等教育总入学率(Gross Tertiary Enrolment Ratio),这一数字从15.4%上升到了35.7%(见图1-1)。2.159亿名大学生中有五分之四学习全日制学位课程^①。在60多个国家的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总入学率现在超过50%(UNESCO,2018a)。大众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完成率因国家而异。在最贫穷的30%的系统参与中,这一数值大都很低(Marginson,2016a)。然而,无论如何,世界正在经历受教育“能力”的大幅增长,这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创造的术语(Sen,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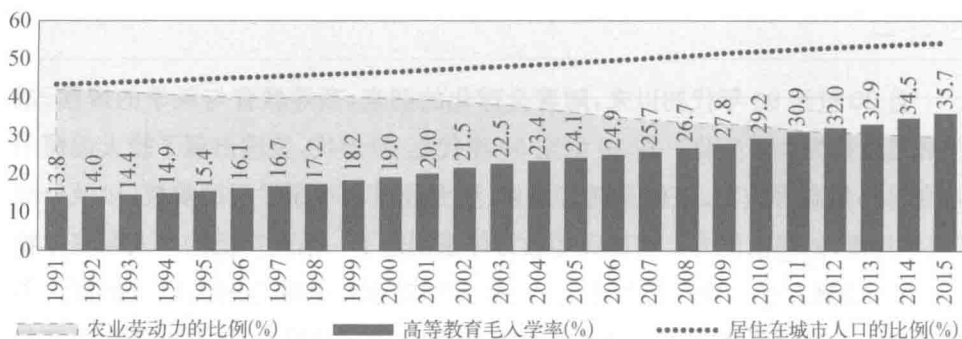


图1-1 全球高等教育入学率与城市居民比例和农业劳动力比例的比较(1991—2015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a)。

全球现代化和发展的动力推动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这个过程既是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同时又是政治和经济的,这一动力比资本积累的动力更大,是最明显的发展动力。高等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也是非常不平衡的。拉贾尼·奈多(Rajani Naidoo,2014)提到“综合和不平衡的发展”。就经济资源、政策和国家机构的一致性、学习文化和中产阶级的规模等方面而言,各国建设高等教育的条件各不相同。无论如何,在新兴国家中,拥有一万年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b)的“高等教育”指的是课程项目,而非院校,包括“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5—8级的所有课程,即两年制同等学力(5级)到学士学位(6级)、硕士课程(7级)和博士课程(8级)。在许多国家,所有5—8级的活动都归类为“高等教育”,但在有些国家,该术语仅限于6—8级的课程,或仅限于指定院校的活动。